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结构与弱势群体地位提升路径分析*

闫伯汉

摘要: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把握其形成的动力机制,是探寻弱势群体向上流动路径的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是弱势群体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向上流动困难。个体地位获得主导机制的变化和制度变革是中国社会结构形成的重要动力。家庭、学校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因素,而社会流动深受制度设置的影响。因此,实现弱势群体地位的提升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的共同参与,同时社会组织灵活多样的帮扶工作、个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有助于弱势人员地位的改变。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再生产;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3-0088-06

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而且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逐渐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除低收入人员外,还涵盖了其他处境困难的人员。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其称为“弱势群体”。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帮扶救助,如近年来组织实施的“脱贫攻坚战”就是党和政府为提升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实现全体人员“共同富裕”的目标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学界对弱势群体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弱势群体含义的细化区分^①、不同类型弱势群体生存情境的差异以及改变其地位的各种路径。从研究逻辑讲,这种具体化的研究较为深入细致,但过于关注微观生活情境的精细化研究,容易忽略那些对不同弱势群体均产生影响的共同因素。鉴于此,本研究将

弱势群体与宏观的社会阶层结构联系起来,与中观的生活情境联系起来,与微观的个体地位获得联系起来,在结构形成的动力机制分析中了解其再生产机制,进而探析提升其地位的可能路径。

一、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动力机制

1. 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

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面貌,把握其形成的动力机制,是探寻弱势群体地位提升路径的基础。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判断,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伴随工业化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中国社会将变得更为开放。这种观点以陆学艺为代表,认为现代社会的阶层特征应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大多数,底层、上层占少数,形状像“纺锤”一样。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分化加剧,工人、农业劳动者比重下降,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服务人员比重上升,整个社会的职业结构呈现明显的“趋高级化”。^②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向“中产化”演进,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③

收稿日期:2021-06-16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再生产机制与弱势阶层子女的向上流动研究”(16CSH008);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留守与流动经历对儿童发展影响的逆向研究”(2020GGJS119)。

作者简介:闫伯汉,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郑州 450046)。

另一种观点则属于悲观论调,对中国社会结构作出了封闭性判断,直接或间接强调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界限的清晰化、分化趋势的结构化和定型化、底层向上流动的困难化。其依据是身份制、地域差异、体制差异等制度壁垒^④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再分配权力转换、延续和市场内在的无法克服的不平等机制^⑤的存在。

显然,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整体状况的判断上,两种观点在回答“中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层固化趋势”这一问题时出现了分歧。理论判断需要经验事实的检验。一些学者基于教育获得、收入等研究支持“阶层固化论”。如有研究者利用北京大学新生录取花名册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有明显下降趋势。^⑥不仅如此,农村子弟在“985”“211”高等学校这些优势教育资源上的教育机会也出现了下降趋势。^⑦还有学者从1989年至2011年中国家庭经济地位和收入水平的变化中发现在近20年的时间里,原来处于底层的家庭很大概率还在底层,原来处于顶层的家庭很大可能仍在顶层;不但家庭的经济地位呈现再生产状态,而且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⑧也有一些研究不支持“阶层固化论”。^⑨但是无论是否支持“阶层固化论”,研究者大都承认相较改革开放初期,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垂直流动呈现下降的趋势^⑩,中国社会在宏观制度政策、中观行为机制、微观差异化个体能动性等方面存在影响阶层正常流动的阻碍因素。^⑪有研究者基于中西方横向比较,发现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率更高,显示出更强的社会流动性;而纵向比较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前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率呈下降趋势。^⑫

概而言之,这些研究认为,就中国社会各阶层间的相对关系而言,因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阶层间持续的优势累积,社会各阶层的相对位置仍将呈现与西方社会大致类似的社会代际流动模式:代际继承性及短距离流动性、阶层再生产特征明显。^⑬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重大制度转型和高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虽然代际关联度相对较低,但是,代际间的继承性趋势仍然强于流动性。”^⑭这就是中国阶层结构的现状,弱势群体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向上流动困难。

2. 中国社会结构形成的动力机制分析

分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动力机制,可以

从微观的个体地位获得视角与宏观的制度变革视角进行。前者聚焦到底是先赋因素还是后致因素在个人地位获得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后者则更为重视制度变革对阶层结构的影响。

(1)个体地位获得的主导机制变化。社会分层领域的经典研究——“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决定个体地位获得的机制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社会,先赋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后致因素决定着个人地位的获得。^⑮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导机制发生了变化,即由改革开放前身份等先赋因素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转变为改革开放后教育、经济收入等自致因素决定不同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相较于改革开放前,改革后自致因素对于地位获得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当然,个体地位获得的主导机制变化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制度变革原因。

(2)制度变革。改革开放启动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巨大的制度变革对不同群体而言有着十分不同的意义。倪志伟认为,市场转型过程就是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市场转型导致再分配权力向市场让渡,向直接生产者转移,这意味着直接生产者在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市场成为社会经济流动的另一条渠道,市场改革为再分配以外的部门创造了更多机会,获取了更多的经济利益。简言之,市场转型将降低政治资本的回报,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⑯上述市场转型论遭到了后来研究者的不断质疑。“权力维继论”强调,由于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在执政党地位与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动摇状况下进行的改革,保证了再分配权力对资源的控制。^⑰魏昂德认为,市场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制度,脱离这些具体条件和制度环境,不可能预测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群体获益的问题也难以判断。^⑱周雪光认为,政治与市场并非相互对立,国家在建立规则制度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市场正是在这些规则制度中运作的,经济活动也会引发国家政策制度的变革;要更好地理解不同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优劣地位的来源,就应抛弃将与传统市场转型理论有关的再分配制度(老的制度)与市场制度(新的制度)加以区分的标签,考虑

被观察到的经济交易和“新”制度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或政治原则所支配的,要深入理解政策制度在政治领域的制定过程,尤其是理解“老的”和“新的”利益对政策制度制定过程施加影响的方式。^⑩上述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争论使学者们逐渐形成了以下共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具有再生产的特征;市场与再分配之间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考察社会转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应高度关注不同社会转型的独特过程、具体模式以及与原有制度之间的“路径依赖”,关注具体条件和制度环境。

可见,可以从两个角度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一个是市场转型论及其相关争论的宏观制度变革视角,一个是地位获得模型的微观个体地位获得视角。宏观层面的讨论既可视作微观个体地位获得的分析背景,也可看作微观个体地位获得的深层次原因。其实,无论微观个体地位获得的分析,还是宏观层面的诸多争论,都仅关注于社会分层模式的特征,其中前者关注到底是先赋性还是后致性因素主导当前的分层模式,后者则关注社会分层模式的再生产特征。但是,它们没有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再生产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具体而言,弱势群体是如何被再生产的?进而言之,在一个弱势群体向上流动困难的社会,有没有一些有助于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可能路径?

二、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一些基本判断

探寻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路径,需要了解中国阶层结构特别是阶层间相对关系的基本特点,了解弱势群体所在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影响其地位获得的个体性、群体性、结构性因素及其作用的大小,即把握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一些基本判断。

1. 弱势群体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社会结构分析表明,中国社会的再生产特征明显,即优势群体更容易保持、延续其优势地位,弱势群体更易落入阶层再生产,向上流动困难。但弱势群体整体上的再生产并非意味其是一个固化的、永远没有向上流动机会的群体。弱势者及其子女克服重重困难,逆流而上,成功实现阶层跨越的案例并不罕见,这表明弱势人员向上流动是有机会、有希望的。下文的分析也将表明,只要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及个人协调配合,策略得当,相当规模的弱势人员

都可能实现地位提升,改变其再生产的命运。

2.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寻找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路径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人类生活的环境视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这一系统由近及远分别为微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与宏系统。微系统是个体直接面对、接触的人或物,如家庭、学校等;中间系统指微系统间的互动关系;外部系统是中间系统的延伸;宏系统指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如制度、文化等。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深受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⑪按照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弱势群体再生产或向上流动的主导机制存在于其所在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这个生态系统既包括远端的制度文化情境,也包括近端的物质条件、互动人群情境。有些情境(如家庭文化资本)难以改变,有些情境(如教育政策)则易于改变或深受社会中控制性权力关系的操控,易受权力影响的情境为干预社会再生产特别是促进弱势群体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具体而言,当今社会影响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与体制、权力关系密切的制度环境以及家庭和学校。

(1)家庭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这不仅被有关家庭理论充分论述,也被有关家庭与个体地位获得的经验研究反复证实。在家庭诸多资源中,研究者特别重视家庭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及家庭养育方式的差异对儿童发展路径的影响。家庭养育理论认为,家庭养育方式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底层家庭采用“自然成长”方式,优势阶层采用“协作培养”方式;底层家庭子女在日常活动中有更多的自主权、闲暇时间的控制权,在家庭中普遍运用指令性语言,家庭也经常屈服、顺从于学校权威;优势家庭则依据协作培养的教养逻辑,以孩子的发展为目的,安排孩子的日常活动,干预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各种事务,鼓励孩子表达观点。显然,不同的养育方式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协作培养”模式下的孩子虽缺失了与亲戚的联络及一些闲暇时间,却获得了优越感、自信心,习得的技能使其日后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更易处于优势地位,而“自然成长”模式下的孩子体验到了局促感、疏离感,不利于学业成功及日后劳动力市场竞争,这为其日后的地位获得奠定了基础。^⑫由此,家庭养育方式与家庭文化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文化资本甚至决定了家庭养育的方式。不同于家庭经济资本以

资源转化的方式作用于子女地位获得的情况,文化资本常常以文化再生产的方式作用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其作用机制体现为文化资本丰富的家庭有更好的学习氛围,对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在指导孩子学习成长上有更有效的方法和技巧。虽然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地位获得的作用至为关键,但与经济资本相比,其有着不易改变的特点。因此,消除文化资本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更为艰难,需要强烈、持续的外力干预。

(2) 学校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学校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也是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以绩效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教育对于个人地位的获得愈加重要,其甚至成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最重要渠道。而且,家庭资源中对儿童成长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化资本、教育期望等也与学校教育关系密切。家长的教育程度通常作为衡量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标志。家长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本越丰富;家长的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越有利于子女的学业发展。因此,投资教育、改变教育不平等往往被认为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弱势群体再生产进行干预的最有效手段。^②就中国学校教育的现实而言,一方面,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各阶段教育机会供给量持续快速增加,各个阶层都从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获益,特别是一些底层子弟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这说明教育发挥了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这种不平等既表现为从幼儿园到大学各阶段教育质量的不平等,也表现为城乡教育资源的天壤之别。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表明学校教育阶层再生产仍在持续发挥作用。为此,如何抑制学校教育阶层再生产的效应、充分发挥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恶性循环、促进其发挥社会流动的作用,一直是研究者及政策实践者努力的方向。当然,这种努力的尝试多种多样,着力点也各有不同。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童年时代的早期是儿童成长发展的敏感期、关键期,这一时期不仅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对儿童的社会行为、心理发展也同样重要。^③因此,在此关键期内实施适当的良性干预,进行优质的早期学校教育,将会使弱势儿童受益无穷。

(3) 制度设置是促进弱势群体地位提升的根本保证。阶层再生产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机制存在于

一个社会的宏观制度支持与微观制度安排中。这些宏观和微观的制度设置与历史传统、文化习惯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有着明显的权力制约印记,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阶层再生产的发生就是权力设计下制度设置的结果。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阶层再生产与社会流动的地位在不同时期表现明显不同,一些时期社会流动较为剧烈,另一些时期阶层再生产的特征较为明显,但无论如何,制度设置都起到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制度设置以强制或教化的方式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规则运作的正常结果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势阶层的地位优势得以维持,作为一个整体的弱势阶层的地位劣势得以延续,发生阶层再生产。对制度设置进行有利于某些特定群体的调整,有利于这些群体的发展壮大。因此,弱势群体地位的提升,应充分考虑中国社会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富有自身特色的特征,特别重视在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国家力量的关键作用,注重考察制度设置及其变化与弱势群体再生产的关系。

三、弱势群体地位的提升路径

促进弱势群体地位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家庭、学校、社会、个人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1. 政府以调整制度设置的方式进行干预

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总结为“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并将其特点概括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④,强调强力政府、国家主导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特征。批评者认为,政府应该继续放权,直到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然而,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⑤,市场扩张具有贪婪性、不可控性,会引发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道德沦陷、社会正义缺失等问题,如果不进行干预会引发严重后果。因此,自发调节的市场是要不得的,市场需要在权力、社会的约束下运作。就弱势群体的地位获得看,如果放任市场扩张,只会使弱者愈弱,向上流动几乎不可能实现。而对阶层地位获得、阶层固化进行强力干预,促进弱势群体的向上流动,恰恰是我国政治体制、治理体系的优势。因此,政府对弱势群体向上流动从制度上予以规范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调整那些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设置。另一方面,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调整。应废除那些具

有直接排斥效应的教育制度;改革教育制度设置的双重分割性,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缩小城乡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的差异;重视学前教育,特别是重视农村、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保证适龄儿童都能进入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继续坚持完善并实施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教育照顾政策;立法保护流动儿童公平接受各类教育的权利。从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作用看,政府干预应体现在对子女学业成就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上,即注重提高为人父母者的教育程度,提高每一位公民的教育程度。从缩小阶层差异的角度看,政府可以通过促进教育资源均衡来弥补家庭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分化,通过缩小学校之间在教学质量和学生阶层构成上的差异,为不同阶层学生通过后天努力获取文化资源、实现向上流动创造条件。

2. 家庭以利于子女发展为标准进行决策

为阻断弱势人员的代际传递,其父母应认识到言语激励、行为垂范对子女的能动性发挥、学业成绩提升多有助益,家庭的行为支持、理解型亲子关系也有益于子女的学业成功,这些均可为子女以后的成长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弱势人员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较低,受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很难达到上述要求。那么,为了子女的发展,这些家长至少要把握一些有利于子女发展的契机和子女地位提升的外在结构性因素。以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两个弱势群体为例,已有研究表明,无论在认知发展、教育获得方面,还是在心理、身体健康方面,留守对儿童都有着明显的不利影响。相反,跟随父母的乡城流动,通过“转校”“改变认知刺激环境”等机制对儿童的学业成绩、认知水平的提升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民工父母应尽量将未成年子女带在身边,在城市生活学习。显然,这对于相当数量在城市艰难谋生的农民工来说并非易事。说到底,家庭式流动的决策并非仅是家庭的事,决策背后包含着对所在城市生活成本、融入感、接纳度等的考量,一些农民工将子女留在家乡,大多是因为身份带来的福利待遇、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一系列关乎归属感的政策的区别对待。因此,为鼓励家庭式流动,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坚决取缔因身份而异的政策制度。在此方面,可喜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最新研究表明,家庭式流动正成为一种趋势,新生代农

民工父母越来越倾向于安排子女在随迁地就学。

3. 社会组织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发挥帮扶作用

社会学视角下的弱势群体研究既有大样本的群体状况描述、生存境遇原因分析,也有典型样本的深度个案分析,这些研究为世人呈现了诸多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以及造成如此状况的个人、家庭和制度原因,也为相关部门改进性、保护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然而,相关政策的制定往往在问题出现之后,具有滞后性,而且弱势群体规模较大,遭遇的问题各种各样,很难简单涵盖在某一个政策之下,也很难仅凭政府部门“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就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关爱,除政府部门颁布法律、政策这一根本手段之外,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专业的社会工作及社会公益组织早已参与此项活动,它们凭借专业知识,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许多及时有效的服务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社会组织帮扶工作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第一,加强系统性。社会工作及社会公益组织在一些弱势群体的帮扶过程中发挥了专业优势,初步改善了他们的困境。但这些帮扶干预往往针对的是具体的、表面的需求,无法摆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困境,使效果评估的有效性无法持续。究其原因,社会组织的干预缺乏系统性,缺乏对弱势群体生存活动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关注。因此,要增强干预的有效性,就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系统进行资源的整合利用。第二,加强优势视角。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是指导社会工作及社会公益组织对弱势群体进行帮扶救助服务的两种视角。前者重视困境对弱势群体的消极影响,旨在通过帮扶干预解决其心理、健康等问题,是一种针对具体问题的目的明确的外在帮扶与救助。后者则强调困境可能对弱势群体产生的积极效应,认为干预的重点应放在“增权”上,放在协助帮扶对象发现和激活他们的潜能上。在实际的帮扶救助过程中,问题视角被广泛应用,但由于缺乏对内在潜能的挖掘,往往干预效果缺乏持续性;相反,优势视角下的干预效果具有持续性,但应用较少,需要加强。

4. 个体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充分发挥能动性

王宁在探讨低阶层子女是否还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时强调,尽管阶层资源对代际流动具有支配性作用,但个体能动性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低阶层子女在家庭内生资源不足的情形下,

如果能充分发挥能动性,借助义务教育等外生资源,也可以克服阶层背景的物质资源劣势,实现超越父辈的向上流动。能动性得到发挥的根源之一在于积极的人生态度与远大的人生目标的确立。问题在于低阶层子女往往受制于家庭资源贫乏,更易形成低下的、短视的人生目标,这严重妨碍了其能动性的发挥。因此,可用两种方式突破“短视模式”:一是在目标的规划上采用中产阶层子女的目标,二是及时修正、调整、提升人生目标。^⑳王宁对能动性对社会流动影响的强调同样适用于一些弱势家庭子女,艰难困苦的冲击逼迫、物质资源的匮乏,虽然严重制约着弱势家庭子女的向上流动,但如果充分发挥家庭和个体的能动性,坚韧不拔,发奋图强,充分利用外在的资源,趋利避害,也可以逆流而上,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注释

①王思斌:《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②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③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④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经济界》2006年第1期。⑤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⑥刘云彬、王志明、杨晓芳:《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⑦清华大学课题组:《让每个学子都拥有公平的机会》,《光明日报》2012年7月3日。⑧Yi Chen, Frank A. Cowell. Mobility i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7, Vol. 63, No.2, pp.203-218。⑨顾辉:《社会流动视角下的阶层固化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变迁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陈云松、贺光烨、句国栋:《无关的流动感知:中国

社会“阶层固化”了吗?》,《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6期。⑩⑪Xiang Zhou, Yu Xie. Market Transi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Vol.124, No.6, pp.1810-1847。⑫朱光磊、李晨行:《现实还是风险:“阶层固化”辨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⑬David L Featherman, F Lancaster Jones, Robert M Hauser. 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75, Vol.4, No.4, pp.329-360。⑭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⑮参见 Peter M. Blau,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1967。⑯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Vol.54, No.5, pp.663-681。⑰Yanjie Bian, John R. Log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Vol.61, No.5, pp.739-758。⑱Andrew G. Walde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Vol.101, No.4, pp.1060-1073。⑲Xueguang Zhou.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Vol.105, No.4, pp.1135-1174。⑳Urie Bronfenbrenner.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nual of Child Development*, 1989, Vol.6, No.1, pp.185-246。㉑[美]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宋爽、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页。㉒James J. Heckman, Lakshmi K. Raut. Intergenerational Long-term Effects of Preschool: Structural Estimates from A Discrete Dynamic Programming Model.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16, No.1, pp.164-175。㉓Douglas J. Noble, et al. What Could Cognitive Capital Mean for China's Children?. *Psych Journal*, 2017, No.2, pp.153-160。㉔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文汇报》2005年9月4日。㉕[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㉖王宁、马莲尼:《目标导向与代际社会流动——一个能动性的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海玉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Path Analysis of Status Elevation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Yan bohan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nd grasp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its formation is the basis for exploring the upward mobility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is that disadvantaged groups are in an extremely disadvantaged position and have difficulties in moving upward. Changes in the dominant mechanism for individual status acqui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re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Since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are key factors in social reproduction, while social mobility is deeply restrained by system set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atus change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requires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amily, and school. In addition, the flexible and diverse assistance work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a positive personal attitude towards life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levat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disadvantaged.

Key word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reproduction; disadvantaged groups